读史札记

《大金喇嘛法师宝记》碑“教官”辨伪

高树伟

天聪四年（1630）立《大金喇嘛法师宝记》碑（下称“《宝记》碑”），碑阳刻有汉文、老满文，记述喇嘛法师斡禄打儿罕囊素生平及建塔缘起，碑阴刻有喇嘛门徒、工匠与官员名单。此碑是现存清代最古的碑，因碑阳刻有无圈点满文，成为清史、语言学等领域关注的重要文物。此碑原在辽阳南门外喇嘛园大喇嘛法师斡禄打儿罕囊素塔前，“文革”期间，塔遭破坏，后移至辽阳博物馆（现存辽阳民俗博物馆碑林）。[①]清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冬，日本学者稻叶君山随内藤虎次郎到访东北，发现此碑，并做了拓片，始为学界关注。[②]上世纪 70 年代，又发现碑阴镌有曹雪芹高祖曹振彦的题名，广受红学研究者重视。[③]此后，金毓黻、鸳渊一、曹汛、冯其庸、周汝昌、李奉佐、李勤璞、梁戈峰、黄一农等相继介入研究，成果丰硕。

近数年，笔者竭力搜求此碑旧拓，又充分利用数字化成果查阅史料，发现此碑碑阴衔名“敖官”之“敖”字曾遭毁改，已非旧貌。“史料以求真为尚”[④]，“正误辨伪”是面对史料首先要做的工作。因《宝记》碑碑阴文字涉及先清时期职官制度、曹振彦之履历等问题，历来为清史、红学界所重视，所系非小。故不避繁冗，排次旧拓，勾稽史料，重考此碑相关问题，期盼以当下的数字化环境为依托，将此项研究推向精密。

一、《大金喇嘛法师宝记》碑相关著录与现存旧拓

追溯文献，早期对此碑的著录，皆仅录碑阳。碑阴题名，则不见录文。最早录出碑阴文字的，应是始修于 1927 年、刊行于 1934 年的《奉天通志》。[⑤]据《静晤室日记》，1932 年 12 月，金毓黻曾亲赴喇嘛园查访此碑，且做过拓片。[⑥]《奉天通志》将碑阳、碑阴文字全部录出，录文

[收稿日期] 2017 - 02 - 20
[作者简介] 高树伟（1991 - ），男，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，北京 100871；gsw168@ pku. edu. cn

① 邹宝库：《曹氏题名三碑发现始末》，《乡土》第 6 期，第 42—44 页。感谢梁戈峰寄赠此文复印件。2016 年 10 月 2 日，笔者亲赴辽阳目验原碑，此碑现存辽阳民俗博物馆碑林。

② 稻叶君山在《清朝全史》自序中回忆辽阳拓碑云：“拓辽阳刺麻坟碑，而碑面沃水冻结，斑驳成龟文，燃膏梁火之，冻解，乃得施墨。凡此事迹，今犹历历在心目中也。”参见稻叶君山著，但焘译：《清朝全史》，台湾中华书局，1985 年，第 5 页。

③ 围绕碑阴所镌文字究竟是“敖官”还是“教官”，学界曾有集中讨论，形成二说：一为“教官说”，此说又可析为两端。有学者认为碑阴所刻应是“教官”，是佟养性属下的红衣大炮教官；也有学者认为“教官”是文职，乃天聪年间官学之教职。二是“敖官说”，认为碑阴所镌为“敖官”，是人名，而非衔名。

④ 梁启超：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 年，第 88 页。

⑤ 王树楠等纂：《奉天通志》，《出版说明》，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，1983 年。

⑥ 金毓黻：《静晤室日记》第 4 册，辽沈书社，1993 年，第 2915 页。

“大金喇嘛法师宝记”题下，有双行小注“天聪四年拓本”，可知当时是据拓片转录。

然碑阴多处文字未能辨识，皆以“□”代之，也未能尽依碑文体例原样照录。如碑阴题名抬头所刻“敖官”，录文将其混入人名。与“敖官”隔一行并列的“千总”，未能辨识，同样混入人名。“总镇副参游备等官”题名，也未按原碑体例照录。值得指出的是，《奉天通志》在录文体例、文字辨识上虽有疏漏，但仅就“敖官”二字而言，辨识准确。

1933年8月，金毓黻曾将此碑拓片寄赠日本学者鸳渊一，① 《奉天通志》于次年印行。此前，仅有《满洲金石志》辨识出“曹振彦”三字，似不知是曹雪芹高祖。② 至于辨识出碑阴“曹振彦”三字，且知其为曹雪芹高祖，则迟至70年代末。

1947年刊行的《满洲金石志》，也将碑阳、碑阴全部录出。③ 相较《奉天通志》，《满洲金石志》在文字辨识、体例复原上更为审慎，如将碑阴“教官”（应作“敖官”）“千总”二官衔与首个人名连写，以与下面间隔书写的人名区分开来。

此碑久为学界关注，多次拓存，留下了颇多可供查考的线索。经翻阅各类金石目录、查检书目系统，得此碑旧拓线索凡10条（图1①）。④ 随时间推移，风雨所侵，移动磕碰，碑上残泐面积逐渐扩大，碑上的文字亦随之残损，碑上残泐面积、某些文字的残损程度，均成为考订拓片捶拓时间的重要依据（即碑拓鉴定中的“考据点”）。此碑碑阴有几处残泐，经对比现存旧拓及早期照片，碑阴右下方有一片不规则残泐区域，在某段时间内，其残泐面积扩大了近1/2。

现据早期比较完整的拓片，将此前碑阴未识之字重作释读（图1②）。碑阴拓片有无“咱世甲”（首行末第2名）、“阿牛”的“阿”（2行末第2名）、“二小厮”（3行末第2名）等字，成为判断拓片捶拓时间的重要分水岭（图1③下）。以碑阴现状F为参照，对比现存旧拓碑阴右下方残泐面积可知，拓片A、B、C⑤ 残泐面积较小，捶拓时间早于拓片D、E。

将争论已久的“敖官”二字拎出，大略依时间先后排次（图1③上）。⑥ 经对比，可清晰地

---

① 金毓黻在日记（民国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一）中记载：“稻叶君山博士有书来，介绍鸳渊一教授。作函复之，并寄赠金清安寺碑、明崔源墓志，清白喇嘛碑各揭本。”金毓黻：《静晤室日记》第4册，第3131页。鸳渊一曾发表研究《宝记》碑的文章，亦仅录碑阳。鸳渊一：《满洲碑记考》，目黑书店，昭和十八年（1943），第50—130页，感谢华艺出版社殷芳先生帮助复印此书相关章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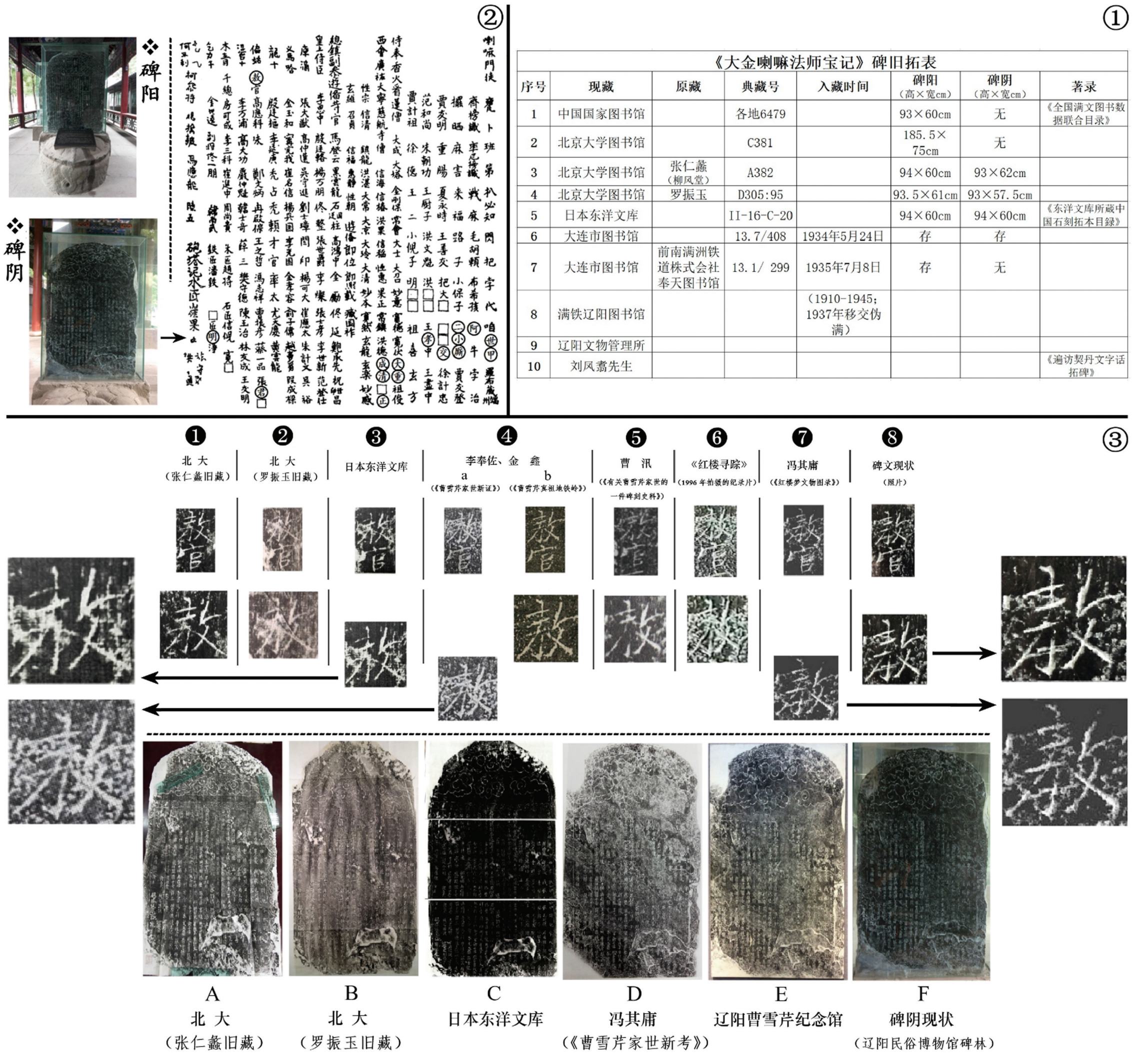
② 罗振玉在《满洲金石志》的序中称，此书是据自己“行　所储”之拓片辑录，具体编纂辑录工作由罗福颐完成。

③ 《满洲金石志》卷6，1937年，叶75b至叶77b。

④ 蒙李勤璞惠赐新著《追随奇异的神》未刊稿相关章节，谨致谢忱！表中6、7、8、9相关材料皆自该书获悉。刘凤翥：《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》，华艺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14、115页。另见刘凤翥：《契丹寻踪：我的拓碑之路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6年，第123—125页。图1①表中第2张拓片，碑高独异，应是著录有误。经笔者实地亲自测量，碑面为102×67.5cm。碑面四周画有界线，碑阳上下边距66cm，左右边距61cm；碑阴上下边距60cm，左右边距55.5cm。

⑤ 感谢胡文彬帮助获取东洋文库所藏拓片。因所得拓片系复制件，纸截为三段，此图为笔者据复制件重新扫描拼接，此拓递藏源流未能详考。据金毓黻《静晤室日记》记载，曾将此碑拓片寄赠日本学者鸳渊一，疑为金氏所拓。

⑥ 此八幅图（包含拓片、影像数据）大略依时间先后排次。图❸为东洋文库藏拓，著录信息参见http：//124.33.215.236/open/show_detail_open_takuhon.php，访问时间：2016-10-07。图❹a，应是照片，参见李奉佐、金鑫：《曹雪芹家世新证》，春风文艺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310页。图❹b，应是拓片，参见李奉佐、金鑫：《曹雪芹真祖地铁岭》，中国铁岭曹雪芹研究会，1998年，书前所附图版。图❺取自曹汛：《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一件碑刻史料——记辽阳喇嘛园〈大金喇嘛法师宝记〉碑》，《文物》1978年第5期，第36-39页。图❻取自专题片《红楼寻踪》，1996年6月，“由北京大观园、上海大观园、正定荣国府和北京电视台联合摄制的5集电视专题片《红楼寻踪》拍摄完毕”，参见《北京市宣武区园林绿化志》，第86页。图❼取自冯其庸：《曹雪芹家世·红楼梦文物图录》，青岛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14页。图❽为笔者摄于辽阳民俗博物馆碑林。



《大金喇嘛法师宝记》碑旧拓表

序号	现藏	原藏	典藏号	入藏时间	碑阳（高×宽cm）	碑阴（高×宽cm）	著录
1	中国国家图书馆		各地6479		93×60cm	无	《全国满文图书数据联合目录》
2	北京大学图书馆		C381		185.5×75cm	无	
3	北京大学图书馆	张仁蠡（柳风堂）	A382		94×60cm	93×62cm	
4	北京大学图书馆	罗振玉	D305:95		93.5×61cm	93×57.5cm	
5	日本东洋文库		II-16-C-20		94×60cm	94×60cm	《东洋文库所藏中国石刻拓本目録》
6	大连市图书馆		13.7/408	1934年5月24日	存	存	
7	大连市图书馆	前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奉天图书馆	13.1/ 299	1935年7月8日	存	无	
8	满铁辽阳图书馆			（1910-1945；1937年移交伪满）			
9	辽阳文物管理所						
10	刘凤翥先生						《遍访契丹文字话拓碑》

图 1　《大金喇嘛法师宝记》碑拓片及碑阴“敖官”①

看到：图❶至图❺，拓片“敖”字左下部无明显“提”笔，图❻虽模糊，亦无明显“提”笔。至图❼❽，“敖”字已多出明显的“提”笔。审视图❼❽，多出的一笔，笔划重叠、笨拙，与整个“敖”字的间架结构颇不相称。

已寓目的拓片，“敖”字多出一笔者，碑阴皆残去“咱世甲”、“阿牛”的“阿”、“二小厮”等字。相反，以上文字尚未残泐的拓片或照片，“敖”字大都完好。可见，“敖”字之毁刻，大概是在碑阴残去“咱世甲”等字以后。依图 1③所排“敖官”资料，“敖”字多出一笔，应是晚近的事。

由是可知，碑阴原刻应是“敖官”，与隔一行的“千总”同为官衔，与其下所刻人名不同，故皆抬头刻写。敖官，是管理仓廒的官员，亦作“厫官”“廒官”，“敖”字笔画最少，刻写最省。除金石材料外，传世文献中也有作“敖官”的例子，如明代王炬的《石楼县营建记》，即有“创乡贤祠三间，廒仓三间，敖官住宅一所”② 的记载。

---

① 图 1②左上为碑阳、左下为碑阴，笔者摄于辽阳民俗博物馆碑林。右侧释文，为曹汛绘制。笔者据所收旧拓与实地目验情况，将此图稍作调整，略去原图栏线，另补释 16 字，以圆圈圈出。

② 《石楼县志》卷 4，雍正刊本，叶 22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，索书号：地 160. 177/33。

二、碑阴“敖官”题名新考

排次旧拓，可直观显示碑阴文字的变化，但更为精细的考据、辨伪，还须从其他史料入手，进而考察“敖官”之下题名人物的履历，探求其迁移轨迹，以考实曹振彦等人名之上的衔名，究竟是“敖官”还是“教官”。

碑阴“敖官”下题名有：

高应科　朱　　郑文炳　冉启倧　王之哲　冯志祥　曹振彦　蔡一品　张君□

李万浦　高大功　严仲魁　韩士奇　薛　三　樊守德　陈玉治　林友成　王友明

关于碑阴题名，此前已有曹汛①、冯其庸②、李奉佐、李广柏③、黄一农等做过考证。以上所列 18 人，其生平履历于史可考者，除曹振彦，尚有冉启倧、王之哲、蔡一品三人，条析如次：

其一，冉启倧

《天聪朝臣工奏议》收了一篇《冉启宗等陈请效力奏》（六月）：

> 黄旗下守备臣冉启宗、曹良辅等谨奏：为效力事。臣等自管粮船天送金国以来，蒙汗出格恩养，每欲图报无由，昼夜思念！关外小大十城，锦州、宁远为战守，不若发兵径取山海。先用大兵围关，布势似乎攻取之状，臣等引数船水兵，扮作南船模样，从前卫海边往西，可用一时，乘机渡进山海关口，将长城水关打开。汉兵惊慌无措，大兵乘势进发，一鼓长驱得关头，仓粮数万里。将山海关城围困，拦住河口，城内无水，围困必得。使关外汉兵城池断绝咽喉，何能保守！臣等经管海运年久，素知山海一带水路，并宁、前、中、后、海沿各处岛口。但逢春之时，正有湾泊滩住粮船，先发兵从海沿哨探，可阻则阻，可掠则掠，用船兵渡进关口，易如反掌。皇上若疑臣等是新人之心，臣等非系所获是粮船，天送来矣。臣等之心，自有天知。蒙恩畜养，寸功未报，但山海登莱，水陆江海，臣等是所熟者，故敢竭力报效，倘成寸功，亦不负皇恩养育。为此上奏。④

案此条奏疏，时间为天聪六年（1632）六月。1924 年，罗振玉编印（着重号系引者所加，下同）《史料丛刊初编》，将沈阳故宫崇谟阁旧藏《奏疏簿》收入，易名为《天聪朝臣工奏议》。⑤ 从时间、官职来看，上录奏疏中的“冉启宗”，应即碑阴题名中的“冉启倧”，是同一人。两处史料所记，冉氏名字有无“亻”旁之差异，或是书写习惯所致。

此篇奏疏是考实碑阴衔名“敖官”的重要史料，尚未见研究者引用，故将全文引在这里。这篇奏疏提供的材料非常丰富，由此可提炼出以下三条比较重要的信息：

1. 天聪六年六月，冉启倧隶黄旗，官职已是守备；
2. 冉启倧曾将管粮船送予金国，变节投降；

---

① 曹汛：《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一件碑刻史料——记辽阳喇嘛园〈大金喇嘛法师宝记〉碑》，《文物》1978 年第 5 期。

② 冯其庸：《〈大金喇嘛法师宝记〉碑“教官”考论》，《红楼梦学刊》2007 年第 5 期。另见氏著《〈大金喇嘛法师宝记〉碑题名考》，收入《沧桑集》，青岛出版社，2012 年，第 29—58 页。

③ 李广柏：《〈大金喇嘛法师宝记〉碑题名考释》，《文史丛考——李广柏自选集》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0 年，第 90—101 页。李广柏：《曹振彦在后金时期的职务》，同上书，第 102—112 页。

④ 罗振玉辑：《史料丛刊初编》，《明清史料丛书八种》第 2 册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5 年，第 424、425 页。

⑤ 今所见《天聪朝臣工奏议》点校本，皆以罗振玉所辑《史料丛刊初编》为底本，不知沈阳崇谟阁旧藏《奏疏簿》是否尚存天壤间。据《静晤室日记》，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，“愚按：罗氏《史料丛刊初编》中已将清初与朝鲜国王往来书收入（湖南先生谓此本有脱漏——树伟按：此行为小字注），前金息侯先生亦贻我钞本一份，惟旧存于崇谟阁，今已失其所在，又奏疏稿及各稿似尚有一部贮存阁中，余当至阁中寻检。”当时，《奏疏》似尚存沈阳崇谟阁。

3. 冉启倧在明朝所任官职，其主要任务是经管海运，涉及管粮船诸事。

以上三条信息，为我们考察碑阴题名提供了新的角度，从冉启倧的履历也可推考“敖官”职事。冉启倧经管海运，且能接触管粮船，与上节所考“敖官”之职事颇能相合。此前，有研究者认为，碑阴衔名应为“教官”，是佟养性红衣大炮部队之教官，然此说已被研究者从红衣大炮之传入、乌真超哈（旧汉军）命名时间等多方考证推翻。① 也有研究者认为，此“教官”是天聪年间官办学校之“教职”，② 并且，此“教官”乃通过天聪三年九月一次选拔考试获取的文职，是因袭明朝旧称的一种官学职务。③ 而此条奏疏中，天聪六年六月，冉启倧任守备，仍是武职，与“教官”（文职）说抵牾。

其二，王之哲

《清太宗实录》卷三〇云：

> 上命分内三院学士、举人、生员、都察院参政、六部启心郎、赞礼官、管仓生员、税课生员为四等，赐人口、牲畜，以内国史院学士罗绣锦，内弘文院学士王文奎，都察院理事官吴景道、王之哲为一等，各赐人六户、骡一、牛二、驴一。④

案此条记载系于崇德元年（1636）六月，此时，王之哲已任督察院理事官。

《满文老档》中也有一条记载：

> 初八日，圣汗赏国史院罗绣锦、杨方兴、梁正大，秘书院李栖凤、雷兴，弘文院王文奎、齐国儒，都察院吴景道、王世哲等各马一。⑤

此条系于崇德元年十月。《满文老档》与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虽同记此事，但相差数月。对比两条史料对事件、人物的记载，多有重合，《满文老档》中的“王世哲”应即《实录》中的“王之哲”。⑥

其三，蔡一品

蔡一品（亦作“蔡义品”）是此碑“委官备御蔡永年”之子。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“附载满洲旗分内之抚顺尼堪姓氏”载：

> 蔡永年，正蓝旗包衣旗鼓人。世居塔山堡地方，来归年分无考。其子蔡义兴，原任知县；蔡义品，原任副将。⑦

案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成书于乾隆年间，所记“原任副将”，也是武职，是蔡义品一生所任最高官职。

勾稽史料，依时间先后对四人履历略作梳理：投降金国以前，冉启倧曾经管海运。天聪四年夏，四人同任敖官。同年八月，曹振彦由敖官致政（即卸任敖官）；⑧ 天聪六年六月，冉启倧已

---

① 李广柏：《〈大金喇嘛法师宝记〉碑题名考释》，《文史丛考——李广柏自选集》，第 94－98 页。李广柏：《曹振彦在后金时期的职务》，同上书，第 102 页。

② 李广柏：《曹振彦在后金时期的职务》，第 106 页。

③ 黄一农：《e—考据时代的新曹学研究：以曹振彦生平为例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11 年第 2 期。另见氏著《二重奏：红学与清史的对话》，“国立清华大学”出版社，2015 年，第 35—38 页。

④ 《清太宗实录》，参见《清实录》第二册，中华书局，1985 年，第 383 页下。李奉佐曾引此条为据，考证碑阴“教官”与蔡一品所任副将官衔不合，参见《曹雪芹真祖地铁岭》，第 57 页。

⑤ 《内阁藏本满文老档·太宗朝（汉文译文）》，辽宁民族出版社，2009 年，第 762 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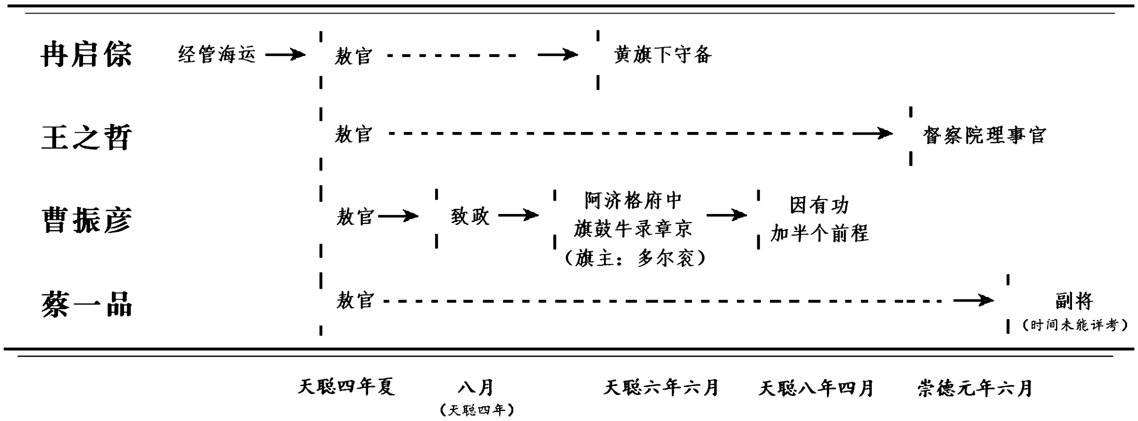
⑥ 黄一农：《e－考据时代的新曹学研究：以曹振彦生平为例》，第 192 页。另见氏著《二重奏：红学与清史的对话》，第 24—49 页。

⑦ 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，辽沈书社，1989 年，第 870 页下。李奉佐考证蔡一品之履历，已利用此条材料，参见李奉佐、金鑫：《曹雪芹家世新证》，第 237、238 页。

⑧ 《重建玉皇庙碑记》碑阴“致政”下刻有曹振彦的名字，研究者对“致政”有不同的解释。据笔者考察，碑阴“致政”应是“卸任旧职”。

升任守备；[1] 天聪八年四月，曹振彦“因有功加半个前程”；[2] 崇德元年六月，王之哲已升任督察院理事官；[3] 蔡一品于某年升任副将。[4]

综上所考，天聪四年后，冉启倧、曹振彦、蔡一品三人，皆为武职。王之哲任督察院理事官之前，为武职的可能性较大。现将四人履历排比如次：



天聪四年以前，只有冉启倧的官职尚可考其大略，为考证敖官之职事提供了证据。天聪、崇德年间，冉启倧、曹振彦、蔡一品皆为武职。王之哲于崇德元年任督察院理事官，应另有晋升途径，不必然是通过天聪三年九月首度考校全国儒生的那场考试。

三、“敖官”与天聪年间的仓储制度

碑阴所镌衔名，总镇、副将、参将、游击、备御、千总，皆因袭明朝武职旧称。天聪四年，“总镇副参游备等官”下领衔的马登云、黑云龙，在金国军队中并无职位，“总镇”仍是因袭被俘前明朝所授官衔。[5] 直至天聪八年，皇太极才下令，“凡我国官名，及城邑名，俱当易以满语，勿仍袭总兵、副将、参将、游击、备御等旧名”。[6] 据笔者考察，名列备御之后、千总之前的“敖官”，同样是因袭明朝职官旧称。

此前，研究者曾以崇德元年六月王之哲任“督察院理事官”（文职），逆推碑阴衔名是“教官”。经过考察，我们认为，王之哲升任督察院理事官之前，其官衔不见得是文职。晋升督察院的路径，在《清太宗实录》中可以找到旁证。据《清太宗实录》，崇德元年六月，对大凌河之战中明朝归附之官，“仍照原衔分别授职，赐之世袭敕书”。[7] 由此可知，当时投降归附的明朝官员是按原衔授职的。其中，副总兵张存仁在大凌河之战中投降金国。崇德元年五月，奉皇太极之命，“以大凌河各官为各部院承政，张存仁为都察院承政”。[8]

也就是说，王之哲任督察院理事官之前，其官衔颇有可能是武职，未必是经过天聪初年的文官考试所获。假若天聪四年这 18 位人物皆为官学之教职（文职），在几年时间内，应无机会迅速转成守备、副将等武职。将上列碑阴名单之前的衔名释为官学之“教官”，与史料抵牾，以

---

① 《冉启宗等陈请效力奏》，第 424、425 页。。
②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 18，第 237 页下。
③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 30，第 383 页下。
④ 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，第 870 页下。
⑤ 李广柏：《〈大金喇嘛法师宝记〉碑题名考释》，《文史丛考——李广柏自选集》，第 93 页。
⑥ 《清太宗实录》卷 18，第 237 页下。
⑦ 《清太实录》卷 30，第 382 页上。
⑧ 《清太实录》卷 29，第 377 页上。

"教官"为天聪年间官学司教人员的结论殊难成立。

敖官（廒官、厫官），应即管理仓廒之官。仓廒（亦作"廒仓"），又作仓厫、仓敖，是储存粮食的处所，以赈济灾民或储存军粮。宋人袁文在《瓮牖闲评》中曾谈到有关"仓敖"的称谓：

> 敖乃地名，秦以敖地为仓故尔。今所在竟谓仓为敖，盖循习之误。《唐书·裴耀卿传》云："东幸就敖粟。"杨文公《谈苑》亦云："此寺前朝废为仓敖。"皆以仓为敖者，抑岂循习之故欤！①

可见，以"仓"为"敖"，的确习用已久。东北地区，为储备粮刍，早在明代，就在芝麻湾建有仓廒。② 明洪武年间，已为二十所军储仓"各置官司其事"③，但未明言此类官职正式称谓。《清太祖实录》云：

> （乙卯）乃谕各牛录，每十人出牛四只，于旷野处屯田，造仓积粮。于是设仓官十六员，吏八员，执掌出入。④

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，已设有仓官 16 员、吏 8 员，且仓官之数与碑阴"敖官"下所列 18 个人名，数量相埒。⑤ 天命年间，东北多处已置仓廒。《满文老档》中，有天命八年二月十六日都堂谕：

> 每牛录男丁三百人，征粮二百石，一百石运往沈阳，另一百石，如属海州人，即存放海州仓，如属辽东人，即存放辽东仓。（中略）着晓谕诸申官所管之汉人等，每三丁征粮二石，一石送往沈阳仓；另一石，如属辽东人，即存放辽东仓，如属复州、盖州、海州人，即存放海州仓。⑥

天命年间，海州、沈阳、辽东等处已置仓廒。皇太极即位后，仓储管理制度逐渐完善。直至天聪五年（1631）七月，仿明朝六部旧制设立户部，"贝勒德格类管户部事"⑦，仓廒管理才有制度层面之统摄。

关于仓廒管理人员的设置，老满文《设立六部档》（天聪五年七月八日）中也有明确记载，所设仓长（满人八，汉人二）即隶属户部，现将译文节录如次：

> 户部的贝勒，管理固山（旗）的贝勒，称为户部的和硕贝勒。未管固山（旗）的台吉，称为户部的台吉。……仓长十：珠申八，尼堪二。税课长十二：珠申八，尼堪四。⑧

从天命三年"设仓官十六员"，到天命八年（1623）已于海州、沈阳、辽东各处设置仓廒，再到天聪五年设立户部，置"仓长十人"。通过这些材料，仓储管理的设置情况便可大致了解。天聪五年以前，仓廒管理虽有其实，却未形成制度。以此坐标去审视天聪四年的《宝记》碑，碑阴所列十八名敖官，似应是六部制度确立以前，据现实情况的权宜之计。

前述碑阴"总镇副参游备等官"领衔马登云、黑云龙二人，系天聪三年十二月被俘之明朝总兵官。天聪七年，方将马登云官复原职，授为三等总兵官。天聪四年，马登云于金国军队中并

---

① 袁文：《瓮牖闲评》卷 6，中华书局，2007 年，第 101 页。

② 天启七年二月，"仍于芝麻湾多建仓廒，以储海运粮刍，一重门限，有泰山四维之势矣"，参见《明熹宗实录》卷 81，"中央研究院"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刊，第 3949 页。

③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 54，"中央研究院"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，第 1062 页。

④ 《清太祖实录》卷 2，《清入关前史料选辑》（一）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1984 年，第 333 页。

⑤ 感谢澳门大学历史学系余一泓提示。

⑥ 《内阁藏本满文老档·太祖朝（汉文译文）》，第 6 函，第 45 册，第 154 页。

⑦ 《清太宗实录》，参见《清实录》第 2 册，第 124 页。

⑧ 此处节录李学智译文，李光涛、李学智编：《明清档案存真选辑》第 2 辑，"中央研究院"历史语言研究所，1973 年，第 26 页。另见季永海、白立元：《谈天聪五年〈设立六部档〉》，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》第 3 辑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91 年，第 65－80 页。季永海：《从辉煌走向濒危——季永海满学论文自选集》，辽宁民族出版社，2013 年，第 113—126 页。

无职位，仍冠以“总镇”之衔。① 同样，依前文所考，冉启倧于明朝经管海运，投降金国后，天聪四年仍冠以“敖官”之衔。

相较明朝与入关后的仓廒制度，天聪年间仓廒的管理虽有些差异，但在职官称谓上，仍沿用明代“仓官”“敖官”旧称。

四、小结

《宝记》碑自20世纪初被发现以来，为清史、红学等领域重视，无论是研究先清国号、旗鼓制度、满语文，还是讨论曹雪芹家族的崛起历程，都绕不开这块碑。此前，由于材料所限，难以辨清碑文原貌，遂致谬误，以讹传讹。碑阴“教官”说，长期为清史、红学界接受，影响极大。

经搜求此碑旧拓、早期影像，据此碑残泐区域面积，大致推考现存几张旧拓的捶拓先后。以此为据，排次旧拓，能较清晰地勾勒出“敖”字变化之轨迹：90年代后，碑阴“敖”字，多出一笔，遂讹作“教”。勾稽“敖官”下题名冉启倧、王之哲、曹振彦、蔡一品的履历，发现天聪四年以后，四人多为武职（因材料所限，惟王之哲任督察院理事官前的官职，未得确考），这与此前的“教官”（文职）说抵牾。

经管仓廒之官，在文献中有“仓官”“敖官”等不同写法，“仓廒”亦作“仓敖”“仓厫”。天聪年间，虽置管粮仓官，但仓廒管理制度尚未完善，对仓官的称谓也多袭明朝之旧。在文献中的反映，则是“仓官”“敖官”杂用。对比碑阴“总镇副参游备等官”及题名，可以发现，当时投降的马登云在金国军队中应无实际职位，仍名列“总镇”之下。通过对冉启倧天聪四年以前履历的考察，可逆推碑阴衔名应是“敖官”，而非“教官”。天聪四年立碑时，冉启倧似投降金国不久，与马登云类似，依其旧职，仍列“敖官”之下。

对史料本身的认识，依赖于对史料的产生、流传、演变等多重因素的考察。近年来，随着古典文献数字化工作加速，可检索的文本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充，以此新环境为依托，广搜材料，对史料本身的环视与考证，必定会发现新材料、新角度，甚至会催生出新的考据路径，促使文史领域发生重要的革新。对《宝记》碑“教官”之辨伪，正是在这样一种期许下尝试完成的。

（感谢南开大学张楚南博士就满文翻译相关问题提供专业意见。笔者赴辽阳考察，任晓辉、林正义、刘洪伟无私提供帮助，一并致谢。）

① 关于马登云（亦作“麻登雲”）被俘及授予原职诸事，详《清太宗实录》卷5、6、9、16，分见第83页下、85页下、86页下、129页上、214页下。参见李广柏：《〈大金喇嘛法师宝记〉碑题名考释》，《文史丛考——李广柏自选集》，第93页。